

· 论著 ·

试论经济因素对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的影响

罗辉 汤巧玲 张惠敏

【摘要】 近代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使许多国人对中医学持否定态度。中医药自身的经济价值、社会各界对中医的经济支持,对于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医教育、临床和行政,无不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分析经济因素对中医存续和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既要把中医药产业视为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把中医药事业当作国家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视并妥善处理中医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才能促进中国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 卫生经济学; 中医近代史; 中医救亡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y in the fight to save TCM in Republic of China LUO Hui, TANG Qiao-ling, ZHANG Hui-m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national nihilism in modern times, many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ts economic value and social economic suppor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victory of the fight for TC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eanwhile, the education, clinical practi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CM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ere all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economy'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of practical valu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CM could be considered both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as a state investment. Only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and social economy is emphasized and handled well, could the national health industry be rapidly developed.

【Key words】 Health economics;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saving of TCM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的苦难日益深重。中医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也遭遇了空前的劫难。在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际,中医界开展了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救亡抗争,保存了中医的命脉,捍卫了民族文化。千百年来,中医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所具有的临床价值是中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在民国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未被废除的根本原因。中医药维系全国民众之健康,关系到国计民生,是当时数百万计的中医、中药从业人员生计之所在,是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近代的历史可体现出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医学术、临床、文化和政治等角度进行论述;本文拟对经济因素在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

争中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分析。

1. 经济因素与中医存废之争中各方的角力

1.1 中药界全力支持中医抗争

据 1929 年的统计,全国中药业职工达 460 万人,药田面积达 60 万亩,种药农工达 200 万人,每年中药贸易达 9 600 万之巨,中药产业是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1]。中医、中药两个行业唇亡齿寒,中医若废,不仅影响当时近百万的中医师,更是断绝了 600 多万中药从业人员的生计。因此,从抗争的第一天起,中药界是抱着“医亡药亡,医兴药兴”的信念来支持中医抗争的,一直是中医救亡斗争中的坚强后盾。

1929 年 2 月 24 日,南京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引起轩然大波。致电向南京政府抗议的除了全国各中医团体外,还有各大城市的众多药商团体。全国商会联合会亦致电南京政

府,要求保存国医。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到会有15行省的131个团体,共262人。场内悬挂巨联一付,上联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下联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正中横幅为“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四周所贴标语甚多,包括“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全国中医药两界团结起来”等。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2]。根据抗争组织者之一的名医陈存仁回忆^[3],当时中药界为会议主办方提供大量的赞助,包括为会务组通电全国各中医团体代表提供邮费;为与会代表提供食宿;为谢观、陈存仁、随翰英等人赴南京请愿提供路费;在报馆刊登广告等,为此次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人民不分种族、行业共赴国难,中药界也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前后方的工作。1938年,中央国医馆因战时西药来源匮乏,供不应求,成立了国防中药研究会,并要求各地成立分会,加强研究。1941年,又在重庆设厂制药,以供救护之需,创办了中国制药厂,生产一系列防疫丹、救急丹等产品^{[4]162}。又如云南白药的发明者曲焕章先生,捐献出3万瓶百宝丹给抗日官兵,在治疗前线将士枪伤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蒋介石还挥毫题写“功效十全”匾额赠送给他。一时间百宝丹的名声与抗日热潮一起传遍国内,产品远销港澳、东南亚、日本等地^[5]。中药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在抗战时期中医地位得以改善的重要原因。

抗战胜利后,帝国主义各国继续拼命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开办医校、医院实施经济侵略。各国继续向我国进口原料药,近1946—1947年就进口原料药7650余吨;同时还大批西药成药运入我国倾销,造成我国许多药厂纷纷倒闭,严重阻碍了我国医药工业的正常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6]。中医界有识之士对此早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早在1929年的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上,就提出了“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等口号。当时舆论普遍怀疑西医的行为实是为西药商人谋利,其背后有国外的经费支持。中医将自己的诉求与民族文化、经济利益相联系,争取到了更多的同盟军。中医、中药、商业界积极投身到抗争之中,形成了浩大的声势^{[4]49},赢得了中医救亡斗争的胜利。从这一点来讲,中医救亡抗争还具有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意义。

1.2 中医药的经济价值与国民政府的立场

国民政府终未废止中医,经济因素也是其重要的考虑之一。1929年12月20日,中医代表再次赴南京请愿,23日,请愿团获得了国民政府文官处有关“撤销一切禁錮中医法令”的公函,此公函不久由蒋介石以4652号训令发出,训令还指出:“总理创三民主义以救国,首重民生,今中国受外人经济力之压迫,每年漏卮有十二万万之巨,自西药销行中国后,年增一年,吾人略有肝心,应如何从积极方面,力图补救?若不提倡中医,使中医药成为有系统医药,则此全国出产之药品,与及全国数百万之药商,势必因之而消灭,于民生问题,关系甚大”^{[4]198}。显然,在对待中医存废问题的态度上,蒋介石是注意到了中医药对于国家经济、民生的重要作用,他本人对中医是持较为肯定和积极的态度,只是没有在实质上采取改善中医处境的措施。

民国时期,西医和西药远远不能满足4亿人民的医疗需要,且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医药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广泛分布于城乡各地,是保障国人健康的主要力量。中药是数百万中药从业人员的生计之所在。同时,中药材和成药的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税收恰恰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在中医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当权者往往对中医是鼎力支持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后,四川方面即发电报至南京政府,称四川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一旦废止中医,就会失去四川民心^[3]。阎锡山主政的山西、陈济棠主政的广东,对中医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这与阎、陈等自身对中医的态度有关,也与他们割据一方,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有关。废除中医,国民政府不但会失去大笔税收,更将失去民心,不利于其政权的稳定。其中的利害关系,国民政府不可能不去权衡。

1.3 废止中医派对经济因素的认识

废除中医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也认识到经济因素对中医存废的影响。他们中有的已指出当时医事卫生不良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弊病;有的提出当时医界之急务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使医药为贫苦大众服务;有的指出中医存废不能仅就学术而下结论等等。如上海医师公会的重要成员陈方之认为,“吾以为欲解答我国之医问题,因不若是之简单也,务宜平其意气,去其主奴,广其思益,综合政情、民情、财情而

兼顾之,互学术、立法、行政而彻论之……。以旧医学劣败为理由谓为即足以淘汰旧医者,此局视学术而不顾其他一切政情、财情之盲目者也。”提出废除中医还应考虑“财情”等因素^[7]。就连余云岫也深知,废除中医案事关重大,涉及近百万中医的切身利益,因而其提案第一条就说:“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8]。可见废止中医派人士亦认识到经济因素对于中医存废所起的作用,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就轻易达到废止中医之目的。

2. 经济因素与中医自救中的困境

2.1 经济因素对中医教育的影响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施今墨曾指出:“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学术之成否,当然在乎学校”^[9]。因此,与中医存废攸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亟待解决的大事。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传承中医命脉,在教育领域进行救亡斗争的努力,一直是中医界有识之士的奋斗目标。从民国初年的“漏列中医案”起,中医一直未被纳入到国家教育系统,缺乏国家财政的资助,举步维艰。因此,经济因素对于中医从事教育的救亡斗争,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所学校的经济来源可靠与否,往往决定了其成败。

民国中医学校普遍面临经济困境,在中药界和社会各界的赞助下,才得以勉力维持,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1929 年“废止中医案”发生后,与广州中医药界联系紧密的香港中医药界也在同日举行集会,香港中药联商会等团体积极呼吁,应“竭力补助我同业艰难缔造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培育中医卓犖人才,保全中国国粹,推销中国国产”,以为治本之策^{[4]54}。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和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是得到中药界援助的典型,两校坚持中医教育数十年,为近代仅有。之所以能长期坚持,除教职员不懈的努力外,当地中药界长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是重要原因。早期中医学校确有成效者还有 1919 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专门学校,该会及该校均得到军阀阎锡山的支持,其设备、师资均较完备,学校常年开支靠 20 万元基金利息支持,这种资本主义化的经营方式保证了学校不会遇到财政支绌^[8]。该校是为近代最先得地方割据势力提倡并给予财政支持的中医教育机关。

2.2 经济因素对中医医院的影响

筹办中医医院,以期促进中医之发展,挽回失去的阵地,从临床疗效中争取话语权,也是中医药界救亡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中医院从经费来源上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但官办医院极少。抗战前民国要人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焦易堂等多方奔走,试图筹建首都国医院,但因经费的制约而未能实现^[10]。民办中医院的经费来源大致分为个人独立承担、向社会好善之士及海外华侨募捐、医药行业捐助、病人捐助和诊费等。由于没有国家政策和经费的支持,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整个民国期间,中医医院的运行状况均不理想,民办和官办中医医院皆如此。政府限制是最大原因,另外也与机制有关。大部分中医院具有不同程度的慈善性质,却较少具有经营性质,这对医院的生存和长期发展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自绝生路。中医院的财力基础本身即不厚实,若再不及时扩大财源,其结果只能是倒闭。即便是有固定拨款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医院,后来在经费上亦捉襟见肘^[11]。从总体上来说,民国中医抗争并未改善自身的境遇,经济因素始终是其中的瓶颈之一。经济状况窘迫的中医医院,未能发挥中医临床之优势,因此也就难以为中医救亡斗争提供有力的支持了。

2.3 经济因素对中央国医馆的影响

中央国医馆的成立以及《中医条例》的通过和公布,是民国中医药界救亡斗争的重大成果。中央国医馆从申办、成立,到日后开展工作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中医界与废止中医派的激烈斗争。作为中医行业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究其实质,仍是半官方半民间组织),中央国医馆担负着中医科研、教育、行业管理等方面的重要职能,承载着中医界太多的期望。尽管它在整理中医学术和为中医争取合法地位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其自身的矛盾性质以及所面临的重重阻力,使其开展工作举步维艰,难以肩负中医界的重任。

经济因素是影响中央国医馆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府第 76 次国务会议准予每月拨给 5 000 元费用,但迭经交涉,至 1931 年 8 月国医馆正式办公月余,拨款仍未见踪影,致职员薪水只好拖欠,日后连 5 000 元也在抗战中被裁免。馆中所需各种款项,多赖各地分馆、支馆的支援或向医药界募集,以维持开展活动^[12]。抗战开始以后,中央国医馆更是

被排除于行政系统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财政的资助。所以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培训班,难以为中医救亡斗争提供有力的支持,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医恶劣的生存环境了。

3. 结语

近代以来,特别是庚子国难后的 30 年内,民族虚无主义风潮盛行,许多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学在内也持有极端否定的态度。中医之所以在当时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能够得以保存,经济因素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医药自身的经济价值、社会各界对中医的经济支持,在中医救亡斗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由于经济因素的制约,民国中医界在教育、临床和行政方面的种种努力处处受到限制,中医的生存和发展极为困难。民国中医前辈能够克服万难,保持和继承中医命脉,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中医,永远值得后人的景仰。

分析经济因素在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中的作用,对当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中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充分发挥中医防治疾病的优势和作用,对于保障国民健康,促进我国医疗改革,控制不断上涨的卫生总费用等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药从种植、炮制、制炼到销售的全过程形成了产业链,中药产业是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中药发展相得益彰。把中医药事业当作国家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视并妥善处理中医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才能促进

中国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当今中医药面临的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中医药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邓铁涛. 中医近代史.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336.
- [2] 胡晓峰. 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回顾与反思. 亚太传统医药, 2006(11): 15-21.
- [3] 陈存仁. 银元时代生活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4] 郑洪, 陆金国. “国医”之殇: 百年中医沉浮录.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0.
- [5] 廖龙祥. 曲焕章传.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1996, (3): 封底.
- [6] 甄志亚. 中国医学史.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169-170.
- [7] 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 [8] 余云岫.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 余岩. 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 祖述宪编译.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217-218.
- [9] 高益民. 著名医家施今墨先生教育思想的初步研究.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04, (6): 9-13.
- [10] 徐建云. 民国时期首都国医院创设未竟之原由探析.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5(1): 31-33.
- [11] 曹丽娟. 民国时期中医医院类型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 2006, 36(1): 18-23.
- [12] 李剑. 中央国医馆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 广州中医学院学报, 1992, 9(2): 116-120.

(收稿日期: 2011-03-17)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 出版消息 ·

李建民先生著《华佗隐藏的手术: 外科的中国医学史》出版

李建民先生著《华佗隐藏的手术: 外科的中国医学史》一书, 已于 2011 年 3 月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李建民先生此书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对历史文献史料的梳理, 李建民先生认为, 中医外科的身体观是“肌肉”身体观, “局部的热”是中医外科的生理及病理核心观念。中医与西医的最大分歧是中医外科的“内科化”。因此, 其在书中就中医外科的分流, 中医内科的扩大化, 以及外科“内科化”的原因及历史过程进行了剖析。并分析了中医外科的治疗方法和特色。

此外, 李建民先生还在书中论述中医外科的治疗方法和特色。

(兰台)

